

特朗普与英美特殊关系的嬗变

徐瑞珂

【内容摘要】 随着特朗普上台执政，英美特殊关系进入了特朗普时期。特朗普执政对英美特殊关系有何影响，特朗普主义又在哪些层面削弱了英美特殊关系，是否会危及这种关系，这些问题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事实上，自二战结束以来，英美特殊关系得以维系的三大因素分别是高度的身份认同感、持久互惠合作以及高度制度化的安全合作机制。高度的身份认同感有利于促进英美对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胁的认知，可以巩固两国之间的战略信任；持久互惠合作有利于促进英美重视彼此的战略价值，促进两国之间的团结；高度制度化的安全合作机制有利于促进英美两国形成良好的合作习惯，强化对彼此的相互依赖。由于特雷莎·梅政府的“全球英国”外交理念与特朗普主义格格不入，以及特朗普破坏了以英美共同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移民政策，双方共同的身份认知受到了一定冲击。此外，由于英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上的利益分歧以及英国在后脱欧时代战略价值的下降，英美互惠合作关系将遭到削弱。尽管如此，高度制度化的英美情报合作、核合作和军事合作在特朗普时期依然密切，维护了英美特殊关系。中国需清醒认识英美特殊关系将继续成为英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因素将制约中英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关键词】 特朗普主义 全球英国 英国脱欧 英美安全合作

【作者简介】 徐瑞珂，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国研究中心讲师（北京 邮编：100089）

【中图分类号】 D85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9)03-0118-20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903007

随着二战后美国霸权的确立以及英国的衰落，美国逐渐在英美特殊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英国则处于从属地位。由于美国总统对英美特殊关系存在不可小觑的影响力，英国历任首相大都热衷于同美国新上任的总统尽快建立亲密合作关系，特雷莎·梅首相亦不例外。梅在特朗普上任仅一周后便应邀访美，成为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首位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在与梅的首次联合记者会上，特朗普公开表示继续支持英美特殊关系。^① 英美特殊关系始于二战期间，成熟于冷战时代，迄今已经存续 70 多年。特朗普对英美特殊关系的认可和拥护延续了自二战以来绝大多数美国总统所遵循的传统。

对英美两国而言，“特殊关系”一词并非仅是空洞的外交辞令。在过去 70 多年中，英美特殊关系虽有所削弱，但依旧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并一直延续到特朗普时期。对英美特殊关系而言，特朗普时期是一个不同寻常且充满挑战的时期。自特朗普于 2017 年 1 月入主白宫以来，其不羁善变的政治个性及其外交政策深刻影响着英美特殊关系，使这种关系一波三折，机遇与挑战并存，震荡中亦有转圜余地。本文将着重探讨特朗普就任以来英美特殊关系有哪些新的变化，特朗普主义在哪些层面削弱了英美特殊关系，是否会使英美特殊关系面临生存危机等问题。

一、维系英美特殊关系的主要因素

1946 年 3 月，丘吉尔在“铁幕演说”中首次使用“特殊关系”这一概念来界定英美关系，此后这一概念一直被英美两国沿用至今。英美特殊关系的正式形成可追溯至二战期间。丘吉尔与罗斯福的亲密关系被视为英美特殊关系的象征。英美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同心协力和史无前例的军事合作为英美特殊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英美特殊关系经历了二战、冷战并在后冷战时代继续活跃于世界政治舞台。英美特殊关系的维系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即共同的身份认知、持久互惠合作以及高度制度化的安全合作。

^① Demetri Sevastopulo and George Parker, “Trump Hands May Promise of ‘Stronger’ Special Relationship,”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8,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2c509c50-e4ba-11e6-9645-c9357a75844a>.

（一）英美自由主义价值观与高度的身份认同感

身份决定对利益和威胁的认知，而身份认同则促进两国对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胁的认知。身份认同还可以促进国家之间的战略信任，成为国家间合作的润滑剂。英美两国存在着高度的身份认同感。在英语圈内，相比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与英国的身份认同感最强，历史渊源最深。

英美两国共同价值观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它主要体现在两国对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共同认知上。^① 自由主要指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其中政治自由强调保护人权和公民政治权利，经济自由则强调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民主和法治是维护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不可或缺的两大制度性保障。需要指出的是，英美共同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在19世纪末以前，英美两国在价值观层面并非彼此深深认同。在美国眼中，英国更像是一个由贵族占主导地位、奉行殖民主义的专制君主国家，与美国的民主格格不入。^② 而同一时期的英国则认为美国是一个粗俗、未开化的国家，并对美国的奴隶制深恶痛绝。^③ 随着19世纪中后期英美两国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双方开始在价值观上越来越相互认同，由此在19世纪末期形成了象征两国高度身份认同感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Anglo-Saxonism），英美两国也实现了大和解（Great Rapprochement）。^④ 而进入当代以后，英美两国视彼此为彰显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自由民主国家，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持有强烈的认同感。这使英美两国的政治精英和公众彼此都形成了高度的身份认同感。

① David Reynolds, "Rethinking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5, No. 1, 1988, p. 100.

② Edward P. Crapol, *America for Americans: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Anglophobia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3, p. 4.

③ Kathleen Burk, *Old World, New World: Great Britain and America from the Beginning*, London: Little Brown, 2007, p. 278.

④ 《1832年改革法案》扩大了英国的选民基础，加速了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也促使美国将英国视为一个民主国家。与此同时，在美国内战中奴隶制被废除，消除了影响英国对美国看法的一大负面因素。在19世纪末，英美两国在政治价值观上的共识已经明显大于分歧，英美两国关系由此出现大和解。自此，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成为英美共同政治价值观的主流意识。参见 Charles Souter Campbell, *From Revolution to Rapproch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1783-1900*, New York: Wiley, 1974, p. 203; Srdjan Vucetic, *The Anglosphere: A Genealogy of a Racialized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4.

高度的身份认同感对英美特殊关系的维系大有裨益。第一，它使英美两国对何为共同利益达成了更多共识。第二，它促进了两国对共同安全威胁的认知。应对共同安全威胁一直是促进英美团结的重要动力，每当英美两国协力应对共同安全威胁之时，英美特殊关系便会更为亲密。第三，它促进了英美之间的战略信任，有利于两国化解分歧或求同存异。由于高度的战略信任，英美两国分歧更像是“家庭内部纠纷”（family spats），容易弥合。^①

（二）英美共同利益与持久互惠合作

英美两国高度的身份认同感并不意味着双方在交往中不再注重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考量。毕竟，英美关系虽然特殊，但从本质上而言仍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中追求自身利益，英美两国亦不例外。从利益的角度而言，英美特殊关系之所以能够长久维系，主要是得益于英美两国都能从其特殊关系中持续获得巨大利益。

英美互惠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英美之间一直存在共同利益，利益契合远大于利益分歧。这是英美互惠合作关系长期存在的前提。如果英美之间不再存在共同利益或者利益分歧超过了利益契合，那么互惠合作关系将很快分崩离析。其次，英美两国都有追求和捍卫共同利益的实力和合作意愿。拥有共同利益的两国并不必然形成互惠合作关系，共同利益的存在为两国创造了互惠合作的愿景，但要实现这一愿景，还需要双方都要有实力和合作意愿。实力越强大，合作意愿越强烈，对彼此的战略价值也就越大。只有对彼此都有战略价值，英美互惠合作关系才能得以维系。

70多年来，美国一直是英国最大的战略资产（strategic asset）。^② 英国能从美国那里持续获得巨大战略利益，美国在英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无可替

^① Robert Hendershot, *Family Spats: Perception, Illusion and Sentimentality in the Anglo-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1950-1976*, Dudweiler Landstr: VDM Publishing, 2008.

^② 关于联盟关系的讨论，战略资产与战略负担（strategic liability）是一组常用的概念。如果盟友 A 能够推动盟友 B 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促进其国家利益，那么盟友 A 对盟友 B 而言便是战略资产，反之则是战略负担。参见 Robert Satloff and Chas Freeman, *Israel: Asset or Liability? A Debate on the Value of the U.S.-Israel Relationship*,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10,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uploads/Documents/pubs/SatloffDebate.pdf>; Ruike Xu and Wyn Rees, “Comparing the Anglo-American and Israeli-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s in the Obama Era: An Alliance Persistenc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41, No. 4, 2018.

代。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英美两国完成了世界霸权的和平转移。^① 自二战结束以来，英国再也无法成为能够主宰世界的一流大国。随着大英帝国光环在冷战期间的逐渐褪去，英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外交定位，以适应英国衰落的现实。英国实力无法再与美苏比肩，但其大国雄心犹在。对怀有大国雄心的英国而言，最佳战略选择是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以维护其大国地位，实现英国衰落的软着陆。正是由于美国的扶持，英国才得以成为世界二流大国中的佼佼者，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超出其自身实力的影响力。

英国虽然衰落，但还远未沦为美国可有可无的盟友的地步。美国也持续从与英国的合作中获得战略利益。英国依然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军事投射能力的盟友之一。^② 从1945年到2016年，英美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是维护二战后缔造的“自由国际秩序”^③。英国一直是美国所青睐的捍卫“自由国际秩序”的得力盟友，它不仅是帮助美国赢得冷战胜利的最大功臣，而且是协助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打击恐怖主义、应对核扩散以及俄罗斯地缘政治威胁的最积极和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英国虽然在应对中国崛起上并未对美国亦步亦趋，但是在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上依然与美国拥有根本的共同利益。与美国一样，英国也致力于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维护“自由国际秩序”。

（三）英美相互依赖与制度化的安全合作

制度化的联盟更容易维系，这是因为制度化对联盟具有黏合作用，维持现有制度的边际成本往往比创建新制度的成本更低，从而使联盟成员对现有制度产生路径依赖，不会轻易“改弦易辙”。^④ 合作关系的制度化有利于加

^① Feng Yongping, “The Peaceful Transition of Power from the UK to the U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1, 2006, pp. 83-108.

^② 冯存万：《构建全球新角色：退欧框架下的英国外交评析》，《国际论坛》2018年第4期，第38页。

^③ “自由国际秩序”是西方学术语境下的概念，指自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是缔造这一国际秩序的核心力量，主要反映了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利益。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因而称之为“自由国际秩序”。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自由国际秩序”这一概念并不认可，一般用“现行国际秩序”来指代自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由于本文讨论的是英美两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因而沿用“自由国际秩序”这一概念。

^④ Helga Haftendorn, Robert Keohane, and Celeste Wallender,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0.

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固化国家之间的合作习惯，并提升国家之间的战略信任。英美特殊关系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的联盟。英美两国在情报、核武器和军事领域已经形成了高度制度化的合作关系。正是由于高度制度化，英美两国仍在情报、核武器和军事领域拥有强劲的合作动力，从而成为后冷战时代维系英美特殊关系的三大稳固支柱之一。^①

衡量高度制度化是否促进了英美特殊关系主要从两个方面考察：第一，原有的合作机制是否仍可以促进英美两国的情报、核武器和军事合作；第二，英美两国领导人是否仍然重视这些合作机制。

1946年3月，英美两国签署情报协定（UKUSA Agreement），后来的“五眼联盟”（Five Eyes）由此开始萌动。英国政府通讯总部（GCHQ）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信息情报领域的合作依然是英美情报合作的典范。由于在信息情报领域70多年的密切合作，英美两国政府之间互不监听对方已然成为双方情报机构所遵循的惯例。这也彰显了英美之间高度的信任，没有必要利用情报机构监听对方。与之相比，美国的其他一些重要盟友却被美国情报机构长期监听。比如，2015年斯诺登曝光的一系列机密情报揭露了NSA对法国、德国和以色列的长期监听，引起轩然大波。^②

以1958年《英美共同防卫协定》（UK-US Mutual Defence Agreement）和1963年《英美北极星军售协定》（US-UK Polaris Sales Agreement）为基石，英美两国的日常核合作在2016年仍然按部就班地进行。英美两国在2014

① 大多数英美学者认为维系英美特殊关系的三大支柱是情报合作、核武器合作和军事领域的合作，主要是因为英美两国在这三个领域的密切合作最能彰显其双边关系的特殊性。参见 David Reynolds, “Rethinking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5, No. 1, 1989; John Baylis,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39: The Enduring Allia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Wolfgang Krieger, “The British-American Intelligence Alliance: Very Special Indeed,” in Ursula Lehmkuhl and Gustav Schmidt, eds., *From Enmity to Friendship: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 Augsburg: Wissner-Verlag, 2005; William Wallace and Christopher Phillips, “Reassessing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 2, 2009.

② Kim Willsher, “Obama Calls Hollande to Promise NSA is No Longer Spying on French President,” *Guardian*, June 24,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5/jul/08/nsa-tapped-german-chancellery-decades-wikileaks-claims-merkel>; Glenn Greenwald and Andrew Fishman, “Netanyahu’s Spying Denials Contradicted by Secret NSA Documents,” *Intercept*, March 25, 2015, <https://firstlook.org/theintercept/2015/03/25/netanyahus-spying-denialdirectly-contradicted-secret-nsa-documents/>.

年续签了《英美共同防卫协定》，使该协定的有效期延长至 2024 年。基于该协定，英美两国成立了 17 个联合工作小组，在涉及核武器的各个领域进行细致分工合作，其合作的密切程度在世界上无出其右，英国依然是世界上分享美国核机密最多的国家。^① 此外，根据 1963 年北极星军售协定，英国在 2016 年继续租用美国最先进的三叉戟 II D5 潜射导弹（Trident II (D5)）来作为英国核弹的运载系统。^②

英美制度化的军事合作源远流长。1941 年 12 月 22 日—1942 年 1 月 14 日，英美两国举行阿卡迪亚会议，会议协调了两国在反法西斯侵略中的战略以及合作的具体方式。为加强两国的军事合作和统一指挥作战，英美两国成立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盟军联合司令部、军需品分配委员会等机构。自二战以来，英美军事合作的制度化日益提升。除了北约这一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之外，英美两国也建立了一系列军事合作和交流机制。英美海、陆、空三军日常军事交流十分密切，定期互派军事人员，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定期互派军官授课。^③

综上所述，英美特殊关系之所以能够长久维系，主要得益于英美之间的共同身份认知、长期互惠合作和高度制度化的安全合作机制。下文将从这三个层面深入探讨特朗普上台以来英美特殊关系受到的影响。

二、特朗普政府对英美身份认同的影响

共同的血缘纽带、宗教传统、语言、文化和自由主义价值观是促进英美两国高度身份认同感的主要因素。特朗普的上台无法改变英美两国之间共同的血缘纽带、宗教传统、语言和文化，但却能在政府层面通过政策输出对英

① Ruike Xu, *Alliance Persistence within the Anglo-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Post-Cold War Era*,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26.

② 1982 年，美国同意向英国提供比北极星导弹更先进的三叉戟 II D5 潜射导弹，并依据 1963 年北极星军售协议给予英国同等程度支持。因而 1963 年北极星军售协议依然有效，只是把原先的“北极星导弹”变为“三叉戟 II D5 潜射导弹”，协议条款基本保持不变。

③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Joint Fact Sheet: U.S. and UK Defense Cooperation,” White House, March 14, 2012,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2/03/14/joint-fact-sheet-us-and-uk-defense-cooperation>.

美共同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施加影响。特朗普主义^①背离了英美共同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英美之间的身份认同感。

（一）特雷莎·梅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对彼此的认同感降低

上任伊始，特朗普便下令把丘吉尔的半身塑像重新放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表现出对维系与英国特殊关系的热情期待。^②但是，由于梅与特朗普在外交理念上存在重大差异，梅特组合难以形成类似于撒切尔与里根那样的融洽关系，二者关系呈现高开低走的态势，英美两国政府的关系也呈现貌合神离之势。

自2016年7月接任英国首相之后，梅便将“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作为其首要外交理念，力图让脱欧后的英国继续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大国角色。“全球英国”理念的核心是国际主义，其主要特征是开放、包容和积极外向。^③在“全球英国”理念指导下，梅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取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第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支持多边主义国际机制，并利用国际机制提高英国的国际影响力；^④第三，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发挥英国的建设性作用。

特朗普主义与“全球英国”理念格格不入。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是“美国优先”，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理念。在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把其外交政策理念界定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

① “特朗普主义”（Trumpism or Trump Doctrine）是指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偏好，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特朗普宣布参与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成为媒体和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尽管目前尚未出现对“特朗普主义”概念的统一界定，但媒体和学界均认为“特朗普主义”有如下几个特征：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经济上的重商主义；外交上的现实主义。参见吕虹和孙西辉：《“结构性矛盾”与“特朗普主义”——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双重动因》，《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6期；Danny Toma, *America First: Understanding the Trump Doctrine*, Washington: Regnery Publishing, 2018; Gideon Rachman, “The Trump Doctrine—Coherent, Radical, and Wrong,” *Financial Times*, July 16,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6c9db010-88d1-11e8-b18d-0181731a0340>.

② David Millward, “Donald Trump Returns Winston Churchill’s Bust to the Oval Office,” *Telegraph*, January 21, 2017,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7/01/21/donald-trump-returns-winston-churchills-bust-oval-office/>.

③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Global Britain: UK-US Relations*, London: House of Commons, March 2018, p. 5.

④ *Ibid.*, pp. 7-9.

其实质是打着“美国优先”旗号的特朗普主义。^① 简而言之，“美国优先”就是将美国国家利益放在最优先位置，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就坚决支持，有损于美国利益的就坚决反对，不顾忌是敌是友，不顾忌是否有违美国传统价值观，不顾忌是否有违国际规范。特朗普主义以结果为导向，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特朗普主义的具体外交政策表现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破坏自由贸易规则；漠视多边国际机制，单边主义大行其道；固守右翼民粹主义，仇视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

“全球英国”理念与特朗普主义产生碰撞与摩擦的根源主要在于梅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对当前国际秩序的迥异态度。梅政府积极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继续维护多边国际机制。特朗普政府则对当前的国际秩序颇有微词，意图凭借美国实力重塑国际秩序，并屡屡破坏多边国际机制。这使得梅政府与特朗普政府难以长期维系融洽关系，英美关系不断面临考验，一波三折。自2017年1月以来，梅政府在处理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上颇为伤神、费力。无论是在政府双边关系上还是在对待全球治理问题上，梅政府与特朗普政府都产生了诸多分歧，使英美外交关系屡遭考验。梅与特朗普也未能形成良好的个人关系，与布莱尔/小布什组合以及卡梅伦/奥巴马组合相差甚远，更无法与撒切尔/里根组合比肩。

（二）英国公众对特朗普及美国的认同感降低

特朗普的上台并未影响美国公众对英国的积极看法。在特朗普时期，大多数美国人对英国一如既往地持积极看法。根据盖洛普2018年2月的民意调查结果，89%的美国人对其有好感，仅次于美国公众对加拿大94%的好感度。^② 但是，特朗普的上台却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公众对美国及美国总统的看法。由于特朗普采取一系列背离英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政策，尤其是移民政策，大多数英国人对其持反感态度。例如，特朗普政府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旅行禁令是践踏人权的典型案例，这种做法违背了人人有权受到平等保护的

^①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18, 2017, p. 1.

^② Megan Brennan, “Americans Like Canada Most, North Korea Least,” Gallup News, February 28, 2018, <https://news.gallup.com/poll/228293/americans-canada-north-korea-least.aspx>.

宪政精神。^① 特朗普的旅行禁令在 2017 年 2 月引发了英国至少 12 个城市数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活动。^②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2017 年，只有 50% 的英国人对美国有好感，22% 的英国人对特朗普有好感，创下自 2005 年以来英国公众对美国及其总统好感度的新低。^③ 根据英国舆观调查网（YouGov）2018 年 1 月的民意调查，70% 的英国人对特朗普持反感态度，认为特朗普是一个糟糕且平庸的总统，只有 11% 的英国人对特朗普持欣赏态度，认为特朗普是一个伟大的总统。^④ 英国公众对特朗普的反感具体体现在对特朗普访英一事的态度上。梅在 2017 年 1 月底对特朗普的访英邀请在英国国内引起巨大争议。超过 185 万英国人在 2017 年 2 月向议会请愿反对特朗普访英，31 万英国人则针锋相对，向议会请愿支持特朗普访英。^⑤ 根据英国舆观调查网 2018 年 1 月的民意调查，45% 的英国人支持特朗普访英，39% 的英国人则表示反对。^⑥ 迫于英国公众普遍的反对情绪，特朗普不得不取消了 2018 年 2 月对英国的工作访问，并未能如期参加美国驻英国新大使馆的启用典礼。^⑦ 最终，特朗普在 2018 年 7 月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其间引发数万英国民众的大规模抗

①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 “US Travel Ban: ‘New Policy Breaches Washington’s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UN Experts,” February 1, 2017, <https://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1136&LangID=E>.

② Niamh McIntyre, “Thousands March on London after Week of Global Protests against Trump’s Travel Ban,” *Independent*, February 4, 2017,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home-news/protest-president-donald-trump-travel-ban-muslim-theresa-may-london-jakarta-philippines-a7562566.html>.

③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UK’s Opin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fidence in the U.S. President,”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6/country/231/>.

④ 有 70% 的英国人对特朗普表示反感，其中 36% 的人认为英国政府应该与特朗普划清界限，34% 的英国人鉴于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性认为英国政府应该尝试与特朗普进行合作。参见 Chris Curtis, “Plurality of Britons Once More Support a Trump State Visit,” YouGov Poll, February 6, 2018, <https://yougov.co.uk/news/2018/02/06/plurality-britons-once-again-support-trump-state-v/>.

⑤ Abigail FrymannRouch, “Trump’s Planned UK State Visit Divides Brits,” *DW*, February 19, 2017, <http://www.dw.com/en/trumps-planned-uk-state-visit-divides-brits/a-37579136>.

⑥ Joe Easton, “More Brits Now Favor Trump Visiting the U.K., Poll Says,” *Bloomberg*, February 7, 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2-06/more-brits-favor-trump-visit-if-nhs-swipe-hasn-t-put-them-off>.

⑦ Heather Stewart and David Smith, “Donald Trump Cancels London Visit amid Protest Fears,” *Guardian*, January 12,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8/jan/12/donald-trump-visit-to-london-called-off-amid-fears-of-mass-protests>.

议，那时英国民众的反特朗普情绪依旧居高不下。

三、特朗普政府对英美互惠合作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执政后，英美互惠合作关系受到一定程度削弱，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英美在全球治理上的利益分歧凸显，共同利益减少；英美特殊关系进一步失衡，英国硬实力的持续下降以及美国战略重心的继续东移导致英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下降，而英国受到脱欧的影响对美国的需求感则明显上升。

（一）梅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上的利益分歧

在特朗普执政后，美国这个曾经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关键缔造者和守护者愈益成为“自由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特朗普的战略轻率和任性正在侵蚀“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特质。特朗普的单边主义行动背离了多边主义规则，其以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为特征的经济政策则有违自由贸易，破坏了“自由国际秩序”的开放性原则。与之相对，梅政府依然致力于维护“自由国际秩序”。这些分歧使英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上的利益分化日益明显。

在全球安全治理上，梅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在一些重要的全球安全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比较突出的例子是耶路撒冷问题和伊朗核协议问题。英美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有着难以调和的立场，双方外交裂痕明显。梅政府一向明确反对特朗普政府单边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拒绝效仿美国将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① 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梅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亦矛盾重重。在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5月8日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后，梅政府公开反对特朗普退出该协议。一方面，英国联合欧盟、法国、德国、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签署协议，同意由欧盟牵头建立与伊朗进行石油结算的支付系统，以减轻美国经济制裁对伊朗的冲击。^② 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

^① Samuel Osborne, “UN Votes 14-1 to Condemn Donald Trump's Jerusalem Decision, as US Vetoes Resolution,” *Independent*, December 19, 2017,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us-politics/un-donald-trump-jerusalem-israel-capital-resolution-veto-us-nikki-haley-a8117741.html>.

^②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Iran Deal: EU and Partners Set Up Mechanism to Protect Legitimate Business with Iran,” September 25, 2018,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51066/iran-deal-eu-and-partners-set-mechanism-protect-legitimate-business>

于 2018 年 11 月对伊朗实行石油禁令后，梅政府不顾美国反对，继续支持英国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并鼓励英国企业抓住时机扩大在伊朗的市场。^①

在全球经济治理上，梅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形同陌路。梅政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支持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2018 年 6 月 5 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这有利于英国在脱欧后继续与其他国家保持贸易合作关系。可以预见，脱欧之后，英国将会继续捍卫 WTO 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系。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认为多边主义的全球经济治理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因而推行了一系列明显带有逆全球化特征的单边主义经济政策。^② 特朗普政府无视 WTO 贸易规则，试图让美国在贸易争端上摆脱 WTO 规则的约束。2018 年 9 月，特朗普甚至宣称如果 WTO 不能让美国满意，其将退出 WTO。^③ 除了不再热情支持 WTO 外，特朗普政府对新兴多边贸易机制也大多避而远之。特朗普上任之初便签署行政命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随后冻结了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梅政府则认为新兴多边贸易机制对英国是机遇，英国寻求加入 TPP，并有望成为第一个加入 TPP 的非亚太国家。^④

在全球气候治理上，梅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分歧加大，具体体现在两者对《巴黎协定》的态度上。卡梅伦政府与奥巴马政府曾经在全球气候治理上通力合作，是《巴黎协定》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该协定于 2015 年 12 月达成，由此奠定了 2020 年后全球气候治理的法律和制度基础，在全球气候治理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⑤ 但是，特朗普在 2017 年 6 月 1 日宣布单方面

s-iran_en.

① UK Government, “Doing Business in Iran: Trade and Export Guide,” November 5, 2018,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doing-business-with-iran/frequently-asked-questions-on-doing-business-with-iran>.

② 宋国友：《中国、美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社会科学》2018 年第 8 期，第 29 页。

③ Edward Helmore, “Trump: US Will Quit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unless It ‘Shapes Up,’” *Guardian*, August 31,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8/aug/30/trump-world-trade-organization-tariffs-stock-market>.

④ Justin McCurry, “UK Welcome to Join Pacific Trade Pact after Brexit, Says Japanese PM,” *Guardian*, October 8,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8/oct/08/uk-welcome-to-join-pacific-trade-pact-after-brexit-says-japanese-pm>.

⑤ 李慧明：《〈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国际展望》2016 年第 2

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让英美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合作蒙上了阴影，梅政府对此大失所望。^① 在2017年9月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梅公开批评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行为危及全球和平与安全。^② 为了支持《巴黎协定》，梅政府继续推进其前任提出的国际气候融资计划，^③ 筹建专项基金1.4亿英镑以帮助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并在2018年9月举办了“零排放车辆峰会”（Zero Emission Vehicle Summit）以鼓励发展绿色汽车、新电池和低碳技术。^④

（二）英美两国在互惠合作上进一步失衡

在特朗普时期，英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下降，使英美两国的互惠合作关系进一步失衡。即将脱欧的英国对美国的战略需求提升，但其在满足美国战略需求上却显得更为力不从心。英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在特朗普时期

期，第2页。

① 梅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在《巴黎协定》上的分歧体现了英国和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经济利益的差异。英国倾向于采取自上而下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管制型治理模式，而美国倾向于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国家，在低碳技术和市场管理方面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且英国的碳排放量较小，其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煤改气”政策使温室气体排放显著下降，因此英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比较积极；而美国的排放量较大，短期内实施减排政策对其经济的影响比较大，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总体上是出于国内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短期内可以刺激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复苏。参见 Loren R. Cass, “The Indispensable Awkward Partner: the United Kingdom in European Climate Policy,” in Paul G. Harris, ed., *Europe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7, pp. 63-86; 冯帅：《特朗普时期美国气候政策转变与中美气候外交出路》，《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5期；张莉：《美国气候变化政策演变特征和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走向》，《国际展望》2011年第1期。

② Heather Stewart, “Theresa May Speaks Out against Trump Climate Change Stance at UN,” *Guardian*, September 20,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7/sep/20/theresa-may-speaks-out-against-trump-climate-change-stance-at-un>.

③ 卡梅伦政府在2015年9月推出了国际气候融资计划，承诺在2016—2021年期间投入至少58亿英镑以发展清洁能源，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参见 Ben Riley-Smith, “Cameron Pledges £6bn to Fight Global Climate Change,” *Telegraph*, September 28, 2015,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politics/11895154/Cameron-pledges-6bn-to-fight-global-climate-change.html>.

④ UK Government, “2018 UK Climate Finance Results,” July 2018, p. 1,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21993/2018-UK-Climate-Finance-Results.pdf; UK Government, “PM Announces New Measures to Tackle Effects and Causes of Climate Change,” December 12, 2017,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m-announces-new-measures-to-tackle-effects-and-causes-of-climate-change>; “May’s £106m Drive to Push Green Vehicles,” BBC News, September 11, 2018,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45482456>.

之所以减弱，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英国的军事实力持续下降，使其越来越难以担当起美国最得力军事盟友的角色。英国军事实力的下降主要体现在保守党政府对现役军人数量和防务开支的削减上。在 2010—2018 年保守党执政期间，英国现役军人数量下降了约 19%，从 19.8 万人缩减至 16.1 万人。^① 另外，在防务开支方面，与 2010—2011 年度相比，2014—2015 年度英国实际防务开支下降了 8%。^② 梅政府曾筹划进一步削减现役军人数量和防务开支，但由于此举遭到三军将领和大批保守党议员的强烈反对，梅政府不得不在 2018 年 1 月宣布暂停削减军费和军力的计划。^③ 尽管如此，此前卡梅伦政府对军力和军费的削减已经给当前英国的军事行动带来了负面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2018 年 4 月 14 日英国参与联合打击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在此次军事行动中，英国的表现逊色于法国，难以称得上是美国最得力的军事盟友。^④

第二，英美特殊关系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力下降。自就任总统以来，特朗普进一步把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地区。其“印太”战略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升级版，制衡中国崛起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外交目标。特朗普政府在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抛出“印太”战略，并正式将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印太”战略的三大支柱分别是美

① Ted R. Bromund, "Britain's Military Should be Growing. It's not," *Weekly Standard*, April 27, 2018, <https://www.weeklystandard.com/ted-r-bromund/damn-busted>.

② Malcolm Chalmers, "The 2015 SDSR in Context: From Boom to Bust—And Back Again?" *RUSI Journal*, Vol. 161, No. 1, 2016, p. 6.

③ Joe Watts, "UK Military Cuts Shelved until after New Defence Spending Review," *Independent*, January 23, 2018,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politics/uk-military-cuts-defence-spending-review-government-national-security-council-nsc-theresa-army-a8174856.html>.

④ 由于进行了一系列军费削减，英国只能使用服役将近 40 年的旋风战斗机（Tornado GR4 jets）向叙利亚发射导弹，而且英国没有在负责护卫旋风战斗机的台风战斗机（Typhoons）上安装弹道导弹发射装置。此外，参与此次军事行动的英国 45 型邓肯号驱逐舰（Type 45 Destroyer HMS Duncan）也没有安装弹道导弹发射装置，使其无法发射弹道导弹。与英国相比，法国的军事装备更为精良。法国派出最先进的疾风战斗机（Rafale jets）向叙利亚发射导弹，并由配备了空对空导弹的幻影 2000 战斗机（Mirage 2000s）中队护卫。另外，法国军队也利用朗格多克驱逐舰（Languedoc）向叙利亚发射了弹道导弹。参见 Chloe Kerr, "Syria Bombing: UK Defence Cuts Forced Britain to Take Backseat to France in Airstrikes," *Express*, April 16, 2018, <https://www.express.co.uk/news/world/946771/syria-bombing-uk-military-cuts-syria-attack-missiles-british-army-france-macron>.

日同盟、美印关系和美日印澳四国集团机制。^① 因此，特朗普在上台后进一步强化了与日、印、澳的关系，而英国则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相对冷落。对特朗普政府而言，英美特殊关系在其“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英国不再是美国应对由中国崛起所引起的国际格局重新洗牌的关键盟友。

四、特朗普政府对英美情报、核武器以及军事合作的影响

在特朗普时期，英美两国在情报、核武器和军事合作上的安全合作机制并未受到削弱。原先的合作机制能够继续推进英美双方在上述领域的合作，两国仍然可以用这些旧机制来应对新问题和新的挑战。因此，在特朗普时期，英美两国在上述合作领域继续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

（一）特朗普政府与英美制度化的情报合作

自特朗普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中胜出以来，美国情报部门一直怀疑俄罗斯利用网络攻击手段干预本届美国总统大选。因此，在特朗普时期，应对俄罗斯的网络安全威胁成为英美情报合作的重点。网络安全威胁主要涉及信息情报领域，因而一直专注于信息情报合作的英国 GCHQ 和美国 NSA 在应对网络安全威胁上进一步深化了合作关系。

2018 年 3 月，英国 GCHQ 主管弗莱明（Jeremy Fleming）、英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德弗雷尔（Christopher Deverell）与时任美国 NSA 主管罗杰斯（Mike Rogers）举行了战略评估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将进一步加强 GCHQ 与 NSA 在应对网络安全威胁上的合作。^② 这是 GCHQ 与 NSA 史上首次公开发表联合声明，彰显了双方一如既往的亲密合作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英美情报合作关系在 2017 年 5 月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小风波，原因在于美国情报部门把英国警方分享的曼彻斯特恐怖袭击案嫌疑人的细节泄露给美国媒体，使英国警方对恐怖袭击案的调查陷入被动。英国警

^① 刘胜湘、辛田：《均势制衡与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论析》，《当代亚太》2018 年第 3 期，第 54 页。

^② GCHQ,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An Enduring and Vital Partnership,” March 26, 2018, <https://www.gchq.gov.uk/news-article/joint-statement>.

方于是在 2017 年 5 月 25 日短暂中止了与美国情报部门的情报分享，暂停时间不到 24 小时。为了不影响英美两国情报合作关系的大局，英国主要情报机构军情六处（MI6）、军情五处（MI5）和 GCHQ 并未中止与美国的情报分享。^① 在当天的北约峰会上，梅向特朗普严肃通报了此次情报泄露事件，特朗普对此极为重视，下令严查此事。在得到美国方面新的保证后，英国警方在 25 日当天又恢复了与美国情报部门的情报分享。^② 为了表示美国的诚意，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 5 月 26 日又专程赴英道歉，坦言美国对此次情报泄露事件负全面责任。^③ 这次情报风波也从侧面彰显了特朗普政府对英美情报合作的高度重视。

（二）特朗普政府与英美制度化的核合作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英美核合作并未受到任何负面影响。《英美共同防卫协定》在 2014 年续签 10 年，延长至 2024 年。这意味着在特朗普的整个任期内，英美核合作将会照常进行。2018 年 9 月，英美举行核圆桌会议（Nuclear Round Table），旨在进一步促进英美在核研究和防止核扩散方面的合作。此次核圆桌会议的一个重大成果是英国国家核试验室（National Nuclear Laboratory）与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就核能源研究达成合作协议。^④

根据 1963 年的《北极星军售协定》，英国可以在特朗普时期继续租用美国三叉戟 II D5 潜射导弹作为英国核武器的运载系统。目前只有美国和英国海军可以使用三叉戟 II D5 潜射导弹，这足以证明英美核合作关系的特殊性。2015 年 11 月，美国海军着手将三叉戟 II D5 潜射导弹的服役期延长至

^① Ewen MacAskill, “UK Police End Suspension of Intelligence Sharing with US,” *Guardian*, May 25,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7/may/25/uk-police-end-suspension-of-intelligence-sharing-with-us>.

^② Max Greenwood, “UK Resumes Intelligence-sharing with US: Reports,” *Hill*, May 25, 2017, <http://thehill.com/policy/national-security/335232-uk-resumes-sharing-intelligence-information-with-us-report>.

^③ Will Worley, “US Takes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Manchester Attack Intelligence Leaks, Rex Tillerson Says,” *Independent*, May 26, 2017,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home-news/rex-tillerson-us-manchester-attack-intelligence-leaks-uk-snap-visit-secretary-of-state-photos-salman-a7757746.html>.

^④ “UK and USA Enhance Nuclear Research Cooperation,” *World Nuclear News*, September 14, 2018, <http://www.world-nuclear-news.org/Articles/UK-and-USA-enhance-nuclear-research-cooperation..>

2042年。^① 2016年7月，英国议会以472票对117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梅政府提出的更新和升级英国三叉戟核项目的提案。根据该提案，英国将在未来35年投入310亿英镑（另加10亿英镑应急费用）重新建造4艘可装备三叉戟潜射导弹的新一代核潜艇。^② 这意味着至少在2042年以前，英国仍将租用美国三叉戟II D5潜射导弹，英美紧密的核合作将会持续下去。

（三）特朗普与英美制度化的军事合作

特朗普政府重新重视北约对英美特殊关系是一个积极因素，有利于维护英美两国在北约框架下的安全合作。尽管特朗普依然对欧盟大多数成员防务开支不足GDP的2%颇有微词，但由于俄美关系不断恶化，特朗普逐渐意识到北约的重要价值，不再认为北约是一个过时的军事联盟。在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明确承认北约对维护美国安全的重要性，并重申对北约的安全承诺。^③ 2017年英国防务开支为552亿美元（占英国GDP的2.12%），依然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费开支国。^④

除了北约这一多边安全机制，英美两国之间的双边军事合作机制也对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的维系发挥积极作用。其一，由于1950年《大使协议》^⑤持续生效，目前在英国依然驻扎着8700名美军官兵。美国还计划向其位于英国的莱肯希思空军基地（RAF Lakenheath）增派军人，预计将在2020年增加两个F-35飞行中队。^⑥ 其二，由于2012年《英美防务贸易合作条约》继续生效，英美两国继续在武器研发上密切合作，提高了英美武器系统的互

① “Latest Upgrades to Keep US Trident Ballistic Missiles Operational by 2042,” Sputnik, November 11, 2015, <https://sputniknews.com/military/201511111029900765-trident-ballistic-missiles/>; Kingston Reif, “U.S. Nuclear Modernization Programs,”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March 2018, <https://www.armscontrol.org/print/4693>.

② Ross Kaniuk, “Theresa Wins Nukes War: MPs Vote to Renew £31billion Subs,” *Daily Star*, July 18,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19/world/europe/theresa-may-britain-nuclear-weapons.html>.

③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48.

④ Martin Banks, “Results Are In: Here's How Much NATO Allies Spent on Defence in 2017,” *Defence News*, March 15, 2018, <https://www.defensenews.com/global/europe/2018/03/15/results-are-in-heres-how-much-nato-allies-spent-on-defense-in-2017/>.

⑤ Jonathan Colman, “The 1950 ‘Ambassador’s Agreement’ on USAF Bases in the UK and British Fears of US Atomic Unilateralism,”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2, pp. 285-307.

⑥ Derek E. Mix, “The United Kingdom: Background, Brexit, an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rch 12, 2018, p. 15.

用性（interoperability），有利于英美军队在战场上联合作战。^①其三，由于非正式的合作传统，英国在美国本土的军事司令部中拥有大约 750 名军事参谋，其对美国军事战略制定的影响力高于美国其他任何盟友。尤其是大约有 50 名英国军事参谋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美国中央司令部长驻，参与制定美国对中东和中亚的军事战略，这对促进英美两国在中东和中亚的军事合作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②其四，英美两国军队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和日常军事交流，比如红旗军演和克米特·罗斯福演讲（Kermit Roosevelt Lecture）。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自 1975 年以来每年都会联合举行红旗军演，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红旗军演也未中断。^③克米特·罗斯福演讲系列始于 1947 年，由英国和美国的高级军事将领分别到对方的军事学院发表演讲，每年举办一次，在特朗普执政后亦是如此，这项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巩固英美两国军事合作关系。^④

结 束 语

特朗普讲究实力至上，淡化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让实力衰退的英国在维护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上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相较于此前的卡梅伦政府，梅政府在处理英美特殊关系上更加疲于应对。一方面，梅政府在脱欧公投后更加倚重美国，因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处理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竭力避免英美关系的恶化。另一方面，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迫于英国公众、议会

① Defence Committee, *UK/US Defence Trade Cooperation Treaty*, London: House of Commons, December, 2007, p. 27.

② Wyn Rees and Lance Davies, “The Anglo-American Military Relationship: Institutional Rules, Practices and Narrative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March 1, 2019, p. 11.

③ Nicole Bauke, “Largest Red Flag Exercise to Date Begins in Nevada,” *Air Force Times*, January 25, 2018, <https://www.airforcetimes.com/news/your-air-force/2018/01/25/largest-red-flag-exercise-to-date-begins-in-nevada/>.

④ 2018 年 3 月 7 日，英国陆军中将帕特里克·桑德斯（Patrick Sanders）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发表了第 72 届克米特·罗斯福演讲。同年 6 月 15 日，美国陆军四星上将斯蒂芬·汤森德（Stephen Townsend）在英国智库皇家联合研究所（RUSI）发表了第 72 届克米特·罗斯福演讲。参见 Curt Keester, “Kermit Roosevelt Lecturer Discusses the UK-US Relationship,” *US Army War College*, March 9, 2018, <https://www.armywarcollege.edu/news/article/1108>. RUSI, “General Stephen Townsend to Deliver the Annual Kermit Roosevelt Lecture 2018,” June 15, 2018, <https://rusi.org/event/general-stephen-townsend-deliver-annual-kermit-roosevelt-lecture-2018>.

以及反对党的压力，梅政府在不根本损害英美特殊关系的前提下，也旗帜鲜明地与特朗普政府划清界限，公开反对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外交举措。

梅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着极为相似的反俄立场，视俄罗斯为共同安全威胁，因而两者针对俄罗斯的合作依然默契。在俄罗斯前双面间谍毒杀案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对梅政府给予鼎力支持，美国是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人数最多的国家。^① 在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上，梅政府与特朗普政府通力合作，与俄罗斯针锋相对，在联合国安理会联合抵制俄罗斯。^② 在《中导条约》问题上，梅政府坚决支持特朗普政府退出《中导条约》，指责俄罗斯率先违反该条约，认为美国的退出合情合理。^③

除了与特朗普政府步调一致反对俄罗斯，梅政府也试图通过积极参与亚太事务，提升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梅政府对亚太事务的积极参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梅政府继续推进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升级，扩大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合作，并在亚投行事务中继续扮演积极角色；^④ 另一方面，梅政府紧随特朗普政府，积极推动与印度和日本的安全合作，^⑤ 并在南海问

① Jeremy Diamond, Allie Malloy, and Angela Dewan, “Trump Expelling 60 Russian Diplomats in Wake of UK Nerve Agent Attack,” CNN, March 26, 2018, <https://edition.cnn.com/2018/03/26/politics/us-expel-russian-diplomats/index.html>.

② “Security Council Fails to Adopt Three Resolutions on Chemical Weapons Use in Syria,” UN News, April 10, 2018, <https://news.un.org/en/story/2018/04/1006991>.

③ Peter Stubbley, “UK Stands ‘Absolutely Resolute’ with the US after Trump Pulls Out of Russia Nuclear Weapons Treaty,” *Independent*, October 21, 2018,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politics/uk-us-trump-russia-nuclear-weapons-treaty-withdraw-putin-inf-a8594301.html>.

④ 中英两国在 2017 年 12 月决定建立首期 10 亿美元的中英双边投资基金，英国前首相卡梅伦为该基金的英方负责人。此外，英国在 2017 年 12 月正式承诺向亚投行“项目准备特别基金”捐款 5000 万美元，这是继中国和韩国之后第三个向亚投行特别基金捐款的国家。参见 Nicola Slawson, “David Cameron to Lead £750m UK-China Investment Initiative,” *Guardian*, December 16,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7/dec/16/david-cameron-to-lead-750m-uk-china-investment-initiative>; Chinese Embassy to the UK, “Policy Outcomes of the 9th China-UK Economic and Financial Dialogue,” December 16, 2017, <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eng/zywl/t1520081.htm>.

⑤ 2018 年 4 月，借参加印度主办的国际防务展之际，英国与印度决定拓展防务合作关系，加强两国在防务设备研发上的合作；2018 年 10 月，英日两国军队在日本本土举行了史上首次军事演习。参见 UK Government, “UK Seeking ‘Two-way Street’ on Defence Cooperation with India,” April 10, 2018,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eeking-two-way-street-on-defence-cooperation-with-india>; Christopher Woody, “Japan and the UK are Teaming Up for the First Time to Gain an Edge on China,” *Business Insider*, October 3, 2018,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japan-and-uk-joint-exercises-for-first-time-to-gain-an-edge-on-china-2018-10>.

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2019年1月，英美海军首次在南海地区举行为期6天的联合军事演习，公开向中国示威。^①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俄罗斯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竞争以及其他一些威胁的此起彼伏，对“自由国际秩序”造成了所谓前所未有的挑战，英美两国对此有共同的危机感，这是促使双方继续维系特殊关系的外部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英美两国继续在情报、核武器以及军事领域一如既往地开展密切合作，使英美特殊关系得以经受住特朗普主义的冲击。可以预见，英美特殊关系还会在特朗普执政的剩余时间里遭遇挫折，但并不会在特朗普时期终结。英美特殊关系将会继续成为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个“紧箍咒”，制约中英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但是，鉴于英国一向务实灵活的外交传统，它不会完全追随美国的对华战略。在不伤及英美特殊关系根基的前提下，英国政府将会尽其所能扩大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密切合作，借力中国崛起以保持英国的全球影响力。因而中英两国合作空间依然巨大，中国一方面应该清醒认识到英美特殊关系对中英关系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则应尽可能利用好中英“黄金时代”这一机遇，稳步推进中英务实合作，继续发展双方的友好关系。

[责任编辑：石晨霞]

^① Jesse Johnson, “U.S. and British Navies Conduct First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in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Japan Times*, January 16, 2019,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9/01/16/asia-pacific/u-s-british-navies-conduct-first-joint-military-exercises-disputed-south-china-sea/#.XH5w4NMzaUk>.